

魏司坚所著《保罗末世论》的长远价值，不仅在于它对 [19] 保罗思想基本要素的丰富和深入的分析，更在于书中多次提到作者研究保罗的进路。该书在方法论（或释经学）方面的重要性似乎到目前为止完全被忽略，而这正是我们在本章要仔细关注的。

魏氏研究保罗的进路出自他对保罗的信念。他认为保罗“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基督教末世论之父”（vi 页），甚至说保罗是“有史以来处理基督教数据最杰出的建构思想家”（149 页）。带有这类语气的陈述在书中出现多次。因为使徒保罗的思想“从骨子里具有某种系统性的倾向，从而促使他不遗余力地顺藤摸瓜，探寻从既定前提得出的结果”（60 页）；又因他的思想具有“高度的教义性和整合性”（148 页），因此我们需要正视保罗的“神学系统”（60 页）、他的“真理系统”和他“对基督教真理的建构”（148 页）。保罗“充满活力的末世论思想趋向于形成一个具有紧凑神学架构的统合体系”（61 页）。有太多的学者在诠释保罗时流于肤浅和片面，部分理由是因为“保罗身

©1978 Baker House, Second edition

1987 by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为一位神学思想家，其思想的严谨程度远远超过他们……”
(149 页)。¹

总的来说，这些话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两个因素：(1) 魏氏深深欣赏保罗的独特性，特别是他身为一个思想家的才干。魏氏在保罗思想的性质方面做了一些反省。(2) 魏氏指出保罗和诠释保罗者之间的连续性。两者都关心“基督教的数据”(data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对于末世论的反省是由保罗开始的，他是“末世论之父”。此外，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保罗和诠释保罗者的连续性，在于两者都具有“神学性”的特点。我们若说，当魏氏在研究使徒保罗的时候，他认为保罗和他都在从事同一个神学工程、建造同一座神学大厦，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当然，魏氏在这样做时，他对于圣经的统一性、上帝是圣经的作者和圣经的权威性的确信并没有妥协。

魏氏的进路和亚伯拉罕·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的立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后者拒绝使用“圣经神学”这样的措辞。² 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因为凯波尔在《神学百科》系列著作中的思想，对改革宗神学的方法论有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一直波及到今天。

从表面来看，我们或许认为，凯波尔反对“圣经神学”主要是由于某些历史因素，源于他对理性主义神学的回应；因为后者以伪装的面目、打着“圣经神学”的旗号来攻击

1 Cf. *Biblical Theology*, p.17: “福音具有一种精确、教义性的架构，而极具教义学恩赐的保罗是将这种架构表达出来的最合适人选，这种恩赐是早就被赋予他，并被栽培的。”(本卷最早完成于1948年，是对魏氏于1932年在巴特·克勒文学院所讲课程的修订。)

2 *Encyclopaedie der Heilige Godgeleerdheid*, 3:166-189

圣经的权威。这方面的因素固然重要³，但我们若仔细地考查，就可以看出他的反对立场有着更深的理由。

凯波尔反对使用“圣经神学”这一措辞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圣经是“神学的原料”(principium theologiae)的观念。圣经本身不是神学；圣经是在神学背后的基本原理。⁴ 圣经的作者不应该被称为神学家(176页)，因为若没有在神学产生之先就已形成的“教义”(dogma)，神学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教义乃是(有组织的)教会生活的产品。⁵ 因此，凯波尔划了一道分界线，一边是圣经和圣经的作者们，另一边是教义和教会的神学家们，而凯波尔强调这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断层，或者说非连续性。圣经本身并不包含教义；圣经乃是教会用来“建造”教义的原材料(material)。⁶ 圣经的启示是用“充满象征意义和艺术风格的东方语言”所写下的；只有当擅长于“辩证清晰性”的“西方思想”对圣经的材料进行整理之后，神学才会出现。⁷

我们必须看到：根据“圣经、教会、教义、教义神

3 Ibid., pp.169f., pp.401-404.

4 Ibid., p.167: “若圣经是神学的原理，那么只有当圣经在场时，神学才可能起步。”(Kuyper's italics).

5 Ibid., p.169: “除非教义(信条)成型，否则教义学不可能存在；而教义(信条)是教会生活所结的果子。”(Kuyper's italics); cf. pp.395ff.

6 Ibid.: “圣经中并无教义，只有材料；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使用这些材料，构建了教义。”p.404: “……而圣经自身也并未向我们提供教义，而只有教会用以构建教义的材料”；cf. pp.355ff.

7 Ibid., p.168: “启示是通过圣经赐给我们的，包裹在东方充满象征性审美的语言中。如今，它的内涵由东方世界进入西方，而西方思想意图还地表达人类的普遍思想；神学就开始于这种转型。”cf. vol. II, pp.247f.

学”⁸的次序，以及因为强调它们之间的断层，所以凯波尔不仅是在名称上，而且是在概念上拒绝“圣经神学”。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赞成圣经神学对于材料的关注，即关注圣经的历史性。他哀叹教义神学断章取义式（*loca probantia*）的研经法，并期望透过“启示历史”的研究成果，使人对圣经的理解能够有真实的进展。⁹

尽管以上只是简单的介绍，可是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魏司坚和凯波尔在重点和进路上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1）凯波尔的做法，是将所有的圣经作者们“拉到同一水平线上”来对待。《神学百科》从头到尾都没有考虑过他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抹平这类区别的倾向。¹⁰ 魏司坚的思路总是考虑到保罗思想的“系统性”以及“高度教义性和整合性”的特质，¹¹ 然而凯波尔却坚持认为使徒保罗和其他的圣经作者一样，都是采用“充满象征意义和艺术风格的东方语言”来写作。¹²（2）凯波尔着重强调的是圣经作者和后来教会历史上神学著作之间的断层。因此，当魏氏刻意形容保罗是一位“神学”思想家，并反复提到保罗的“神学系统”，这

8 在凯波尔的思想中，这种区分模式界定清晰且又具有决定性，这从他为《神学百科》四个分部当中的三部的命名可见一斑：De Bibliologische, De Ecclesiologische, 和 De Dogmatologische（最后一项包括了教义学）。

9 *Encyclopaedie*, 3:170ff.

10 *Ibid.*, p.176：“当然，这些人生活在一个敬虔的思想世界中，这个思想世界被用于启示，尽管他们均展现出个体性差异；然而，在启示的历史中，无论是这个敬虔的思想世界，还是这些个体性的差异，都只是圣灵在其上作画的画布。完成启示的是作为画家的圣灵，而不是画布，这是我们当留意的。”

11 Cf. *Biblical Theology*, p.16：“保罗那富有教导性和逻辑性的思想……”

12 只要读过保罗书信，就没有理由做出这样概括。显然，在这一点上，凯波尔对完成《神学百科》的关注让他忘记了自己其他作品中的观点：“保罗书信的难以理解之处，在于东方式的模糊和西方思维方式的清晰……”（*Encyclopaedie*, vol. I, part 2, p.54）；“相较于雅各，保罗更为敏锐……”（*Encyclopaedie*, 2:241）。

种表达模式对凯波尔来说，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

这两种观念在基本的层面上是水火不容的。哪一个是正确的观念？凯波尔的立场代表了典型的改革宗传统的态度，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对保罗的诠释和教义神学建构这两者的关系上。然而，有一系列的考量使我们认为，魏司坚的进路才是对待保罗（作为一名圣经作者和上帝启示的器皿）的正确做法。¹³

圣经的启示与历史有关。圣经乃是启示历史的记录，包括圣经自己形成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分析（这是凯波尔所欢迎的）不断显明：启示是多层面的现象，包括上帝的作为和祂的话语。上帝透过救赎（作为）和启示（话语）来自我启示：祂透过祂所做的和祂所说的来启示。我们越来越看见两者之间的有机关系。启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定直接或间接地与救赎工作有关。上帝的话语一定与祂的作为有关。如果说救赎乃是上帝赐下启示的原因或目标，这样讲并不过分。¹⁴ 我们若认为启示可以被孤立看待，或启示只提供自显的普遍真理 (self-evident general truths)，结果必然是一种不符合圣经的准诺斯底主义的启示观。¹⁵ 因此，上帝的启示必然是祂救赎行动的验证 (authentication) 或解释 (interpretation)。通常，救赎的描述和救赎的解释，在同一位圣经作者（或同一个启示的器皿）的书卷中都可

¹³ 在这些方面的讨论中，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只能停留在开始和概论，无法完全展开。很多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虽然对于自身而言很重要，但考虑到整体，却必须绕过它们。

¹⁴ 在这一观点和相关论述中，魏氏的探讨依然是顶尖的。(*Biblical Theology*, pp.14f., 24, 124, 324ff.)

¹⁵ *Ibid.*, p.24: “启示和救赎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除非考虑后者，否则启示就是空中楼阁。”

以找到，不过，对每位具体的作者而言，描述和解释的比重是不同的，某一方面会更为突出。¹⁶

[23] 毫无疑问，在保罗的作品中，“解释”层面是更为突出的特征。他在讲道与书信中的首要关注，差不多全是对于“救赎历史”的详细解释，即救赎历史如何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事件中达到了顶峰。保罗认为基督在启示历史中的地位，是受到一个特定的“救赎历史处境”的支配和影响的。这对于了解保罗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视角。我们必须体会这一点和它所带来的涵义，才能看清保罗在启示功能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其中一项涵义与我们的讨论有关。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的信徒和保罗是置身于同一个处境。¹⁷ 和保罗一样，我们回顾基督的死亡、复活、升天，同时，我们也和他一同等候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帖前 1:10）；后者乃是救赎历史中尚待成就的大事。在保罗的经验中，那“已然”和“未然”之间的张力，同样也是今日信徒的经验。

因此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和诠释保罗者之间的连续性。

16 新约圣经正典的基本结构反应出了这种特性：福音书（验证）/书信（解释）。这种模式是被刻意编排的，也是本质性的，从马吉安正典的编排也说明了这点，马吉安正典只收录了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关于支持马吉安正典是根据教会正典编排的证据的简要陈述，可参 T. Zahn,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s neutestamentlichen Kanons* (Leipzig: A. Deichert, 1904), pp.28f. 最近，福音真理的恢复显而易见，强有力的支持了这一立场。）如上所述，验证和解释之间的区分不能做机械的应用，就好像福音书中没有解释、书信中没有验证一样。这样的建构显然没有公正地对待耶稣的教导。事实上，新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耶稣（包括他的教导）和使徒（尤其是他们的书信）被关联为“要阐明的伟大事实”和“对这一事实的后续解释”（Vos, *Biblical Theology*, pp.324f.）。

17 Ibid., p.325f.: “并且，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也是生活于新约中的，正如彼得、保罗、约翰一样。”在同一语境中，魏氏提出了极有预见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就是旧约中和新约中的时间间隔看起来是不对称的。这“促成了一种完全以新约自身看待新启示的方式，而非完全为了介绍接下来的一大段时期。”（p.325f. *my italics*）。

两者是处于同一个“救赎历史”的位置（直译：他们有同一个“救赎历史指数”）。不单如此，因着上帝的救赎作为和启示话语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鉴于圣经的焦点乃是救赎历史，所以保罗与诠释保罗者在“神学”上的连续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导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神学应该建立在圣经的文本上；而圣经解释作为一门历史学科，为神学提供了规范性的标准。这样说来，保罗的关注若是解释救赎历史，那么对保罗思想的解释必须拥有同样的关注，即应当从我们共有的救赎历史处境上入手。神学，不论它的涵盖范围和最后形态如何，应当跟随保罗的脚踪，以解释救赎历史的张力作为基本关怀；而救赎历史的张力正是信徒生存处境的写照。为此，神学必须解释和阐明那历代隐藏不言、现今显明出来的“奥秘”（罗 16:25-26）。总而言之，神学从概念上来讲，是由救赎历史的主线所支配的。神学的本质，就是解释救赎历史。因此，保罗与诠释保罗者之间必然有“神学上”的连续性。 [24]

“圣经神学”一般的定义，乃是从一个后世的、与先前不同的有利角度（即救赎历史的角度），回顾上帝的救赎和启示作为在历史中的进程。这是对旧约圣经神学的贴切描述。对新约圣经神学而言，同样不乏对“启示的进展”的关注，但区别在于：如前文所说，今天的解经者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和时空差异，可是在原则上（即按照救赎历史的设定）与新约作者们乃置身于同一个处境。因此，他们和保罗（以及其他新约书信的作者）都在从事同一项

诠释计划。¹⁸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保罗在上帝启示计划中的功能与他身为使徒的职份是分不开的。换言之，保罗身为上帝启示的一个器皿，他在教会中的职份授予他事工的资格和权柄。这意味着：上帝藉着保罗所赐下的默示的话语，或者说无误的启示，同时也就成为教会的权威性教导和信仰内容（教义）；既然这些教义都展示了彼此之间的明显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保罗的“神学”。

[25] 以上介绍的方法论方面的考量，至少有一部分与整体的新约研究（尤其是书信研究）很有关系；其对保罗研究的适用性是本文特别要强调的。这些考量提供了一个视角，使我们能够正确看待保罗书信的独特性。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发掘保罗教导里的教训（didactic）或教义（doctrinal）之特性的时候，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和保罗聚焦于同样的“救赎历史关怀”、置身于同样的“救赎历史处境”。保罗书信的特点是理据严谨，论证周密，这是无需争议的共识，特别是在改革宗圈子里。¹⁹ 可是，若要在更深的意义上体会书信中的“教义性”与“系统性”特质，则必须意识到其中蕴含的“救赎历史”的因素。这样的意识可以保证我们在谈论“保罗神学”的时候遵循合宜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圣经，作为神学的原料，本身就包含神

18 旧约圣经神学和新约圣经神学这种在程序上的不同已经被华菲德（B. B. Warfield）发现了，他在 *The Person of Christ (Biblical Doctri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176）这本书中描述了旧约圣经神学和新约圣经神学这种在程序上的不同“在基本的教导方面，新约圣经更加丰富，因此更容易总结出教义来…”这个观点非常恰当地描述了保罗书信。

19 Cf., e.g. 华菲德 (*Biblical Doctrines*, p.176) 评价保罗为“最富教导性的新约作者”。我们可以假设，甚至凯波尔都无法否认这个评价。

学；至少就保罗书信而言是如此。或者更恰当一点的表达是：我们的神学和其原料（圣经）之间的连续性，究其根本，很多时候是非常“神学性”的。因此，凯波尔的次序至少需要补充。对于新约文本与后世教会中新约诠释之间的断层的认识，需要由对两者之间的（教会与神学上，以及救赎历史上的）连续性的认识来平衡。²⁰

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讨论是在维护和发展魏司坚对保罗的进路。我们尝试说明：（1）保罗的诠释者在研究保罗的时候，应当和保罗站在同一个救赎历史处境、分享同一个救赎历史关怀。（2）基于此立场，他们必须公允地处理 [26] 保罗的教义关怀，这是他身为一位卓越思想家的独特之处。对连续性的如此强调，其表达方式就是：将保罗视作一位神学家。从这个基本的出发点会导出若干重要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对于完整地理解保罗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将保罗视为神学家来对待的意思是，任何神学百科式的架构或区分方法，都不应当忽略保罗置身其中发展他书信思想的处境与后世教会奠定教义的各类处境之间的关联性，这两者从原则上讲并非是不可比较的 (incommensurable)。比方说，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保罗的救赎论

20 在这一点讨论中，无需寻找任何圣经之外的认证，或对完美的圣经作出任何相对的处理（必要性、权威性、明确性、充分性！）。使用微积分的类比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关键点说清楚。救赎事件构成了一个方程（ f ），新约圣经的验证和解释是一阶导数（ f' ），而后来的教会所做的解释是二阶导数（ f'' ）。毫无疑问， f' 和 f'' 的规则截然不同，因为前者是绝对可靠的口头启示（圣经），上帝是原初的作者，而且前者是后者的根据（*principium*）。但这两者都只是导数，都在解释和说明 f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就其级别 level（由不可靠性和暂时性决定）而言， f'' “超越”了 f' ，因为 f'' 将 f' 中本来隐晦的架构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上述讨论并没有忽略或遗忘救赎历史在正典和非正典之间，以及使徒时期和后使徒时期之间的区别。不仅如此，“教会”、“使徒”和“后使徒”有其（救赎历史上的）共同特性，这一事实带来的影响也是被特别留意到的。

复活与救赎：对保罗救赎论的研究

古道译丛·圣经神学

作者：小理查德·伽芬

译者：李树斌

出版：经典传承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观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2103 室

电邮：CCPHservice@hotmail.com

发行：基道出版社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26 富腾工业中心 1011 室

电话：(852)2687 0331

Website: <http://www.logos.com.hk>

承印：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字数：112 千字

版次：二〇一九年八月 初版（简体）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A Study In Paul's Soteriology

Author: Richard B. Gaffin, Jr.

Translator: LI, Shubin

Published by: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Rm 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 Kwun Tong,
Hong Kong

E-Mail: CCPHservice@hotmail.com

Copyright ©1978 Baker Book House, Second edition 1987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1st edition, August 2019

©1978 Baker Book House, Second edition
1987 by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复活 与救赎

当代福音派的教导中存在一些严重的偏差。其中之一是倾向于只传讲福音带来的好处，并将这些好处与作为恩惠施与者的耶稣基督割裂开来。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救恩与基督的主权之间发生了分离。这样的倾向完全扭曲了我们的信仰先辈们所持守的纯正福音性教导。后者强调说：我们所宣讲的，是包裹在福音内的基督；人只有信奉祂才能得救。在本书中，伽芬博士指引我们回归到这个重点。

——辛克莱·傅格森 (SINCLAIR B. FERGUSON)

©1978 Baker House, Second edition
1987 by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HK \$89.00